

党的十八大以来道德治理的状况与发展趋势

赵庆杰

摘要：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道德治理的状况与发展趋势可以从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方面入手。通过分析对比两次全国伦理道德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可知：个人品德方面，呈现出德性完备而德行不足的特点；家庭美德方面，婚姻与两性关系呈现出传统婚姻伦理与现代两性道德的张力，亲子关系在父慈子孝的背后隐藏着代际传承的危机；职业道德方面，在职业认同普遍提升的基础上官德、政德赢得民众的高度赞誉，但要彻底根除腐败依然任重道远；社会公德方面，在整体持续向好的背景下，道德冷漠现象不容忽视。今后在推进道德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由党的全面领导、政府的政策法规引导、社会组织的参与、学校的教育培养、家庭的道德熏陶以及个体的自我修养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道德治理体系，多元共治，形成合力。

关键词：道德治理；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12-0116-12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道德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要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2]43}，“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3]44}，并多次亲切会见道德模范，激励人们向上向善、践行道德，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大大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将其融入社会各个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道德建设的重要引领力量。国家隆重表彰道德模范、“最美人物”等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将道德教育贯穿于教育全过程，推动德育课程改革和创新。社会层面，志愿服务作为道德实践的重要形式得到了蓬勃发展，志愿者人数大幅增加，志愿服务内容日益广泛，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和责任意识日益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通过建立“红黑名单”、推进信用联合激励与惩戒机制等，推动诚信道德建设。家庭、家风、家教建设成效显著，为个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道德治理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坚持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推进，道德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全社会的道德意识显著增强，社会风气明显改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支撑和精神动力。为了准确把握我国道德治理的实效，学术界基于调查数据来分析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已经有了一些代表性成果。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为了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道德治理的最新状况，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组织、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分别于2017年、2022年开展了两次全国伦理道德发展状况调查^①。本文基于这两次调查的数据，从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方面来考察道德治理在各领域的状况与发展趋势，以期对新时代的道德治理有所裨益。

收稿日期：2025-10-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家庭的伦理承载力研究”(25YJA720015)。

作者简介：赵庆杰，男，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249)。

一、个人品德：德性完备与德行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4]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的德性与德行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正如《大学》中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修身被视为实现个人成长、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及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途径。个体修身形成的品德主要体现为内在的德性和外在的德行两个方面，最关键的是知行合一。

表1 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和最需要的德性或道德规范情况调查

您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和最需要的德性或道德规范是什么？										
	第一德性	第二德性		第三德性			第四德性		第五德性	
	爱(仁爱、博爱、友爱)	诚信	责任	宽容	责任	诚信	责任	诚信	孝敬	诚信
2017年	28.8%	15.8%	11.2%	16.0%	15.6%	13.8%	14.5%	11.8%	13.4%	10.8%
2022年	40.7%	11.8%	15.9%	9.4%	14.7%	14.0%	7.8%	13.5%	11.8%	8.7%

两次调查排在第一位的都是“爱(仁爱、博爱、友爱)”，并且选择的比例由2017年的28.8%猛增到2022年的40.7%，说明“爱”作为第一德性毫无疑义，并呈现出被人们越来越认同的趋势。爱作为德性或道德规范，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社会伦理的核心。至于第二、第三、第四德性，两次调查中虽略有不同，但都涉及“诚信”“责任”和“宽容”。诚信中的“诚”，要求个体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都要保持一致性，关注的是个体内心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感；“信”则强调一种对外的承诺和信任，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社会交往的基础。责任既可指行为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角色应承担的职责义务，又可指行为主体对自身行为后果的承担与负责。宽容作为一种德性，要求人们在面对冲突和分歧时能够保持理智，承认他人的存在价值与选择权，理解他人的立场与情感，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果说爱、诚信、责任、宽容是泛泛地指向所有人的德性的话，那么孝敬就是专门指向父母的。作为传统美德的孝敬被凸显出来，显示出家庭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就道德认知而言，人们特别推崇上述美德。

2. 个体的道德情感在持续提升

道德情感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感情体验，如责任感、义务感、羞耻感、同情心等。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如恻

(一) 个体的德性总体上完备而充足

个体内在的德性可以体现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等几个方面。

1. 个体在道德认知方面特别推崇爱、诚信、责任、宽容、孝敬

对个体修身而言，道德认知是第一个环节。每个时代都有其所特别看重的德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仁、义、礼、智、信是“道德五常”，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认知中最重要和最需要的德性是什么呢？结合两次调查数据发现，在列举的18种德性中排在前五名的是爱(仁爱、博爱、友爱)、诚信、责任、宽容和孝敬^[2]。详情见表1。

表1 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和最需要的德性或道德规范情况调查

隐之心是仁之端，“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这种反应体现了人的良知和道德感，强调对他人痛苦的同情。道德情感在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培养道德情感是深化道德认知、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环节。

通过调查数据发现，面对“您常常体验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道德感吗？”的问题，选择“经常有，问心无愧、不做亏心事最重要”的比例最多，并呈上升趋势，由2017年的33.8%上升为2022年的40.1%；而选择“没有，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和利益办事”的比例，由2017年的27.0%下降到2022年的11.0%。这说明人们的道德情感在持续提升。详情见表2。

表2 个体的道德情感状况调查

您常常体验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道德感吗？	2017年	2022年
没有，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和利益办事	27.0%	11.0%
在有监督的环境中或有别人在场时有，其他环境中没有	13.9%	13.8%
经常有，问心无愧、不做亏心事最重要	33.8%	40.1%
一直有，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道德	无此选项	33.8%
没有特别的感觉，不知“道德感”是什么	24.9%	1.2%
其他	0.3%	0.0%

3. 德福一致是中国人稳定的道德信念

道德信念是指个体在道德领域中“对某种道德

理论、道德原则、道德理想的确信态度、情感取向和执着的行动意志力”^{[5]231}。道德信念属于个体德性中的最高层面,是支撑个体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最常见的道德信念就是相信德福一致,它探讨的是“好人”有无“好报”的问题。保证道德行为与幸福的内在统一性,在每个人的心中树立德福一致的信念有助于人们行善。为了实现德福一致的理论自洽,康德曾预设了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及灵魂不朽三大道德公设来为其德福关系证言。除了理论上的论证之外,如果在现实中德福不能一致的话道德仍然难以劝人向善。社会上曾多次出现的“扶老人反被讹诈”的事件让有的人在遇到老人倒地时会犹豫要不要扶,有的人即便扶也会录像留下证据。如果做好事的成本在增加,就会影响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

通过调查数据发现,德福一致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且较稳定。面对“您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中道德和幸福的现实关系是什么?”的问题,选择“总体上道德和幸福能够一致,能惩恶扬善”的比例由2017年的67.9%上升到2022年的69.3%;选择“有道德讲伦理的人大都吃亏,不守道德的人更能讨便宜”的比例由2017年的23.8%下降到2022年的20.3%;选择“道德与幸福没有关系”的仅占少数(2017年占8.3%,2022年占10.4%)。这说明相信德福一致的人占大多数并呈上升趋势。正是在德福一致信念的支撑下,人们不会去模仿别人做坏事。面对“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不守道德反而讨了便宜,您会不会为了得到好处而仿效?”的问题,选择“一定不会这么做”的比例由2017年的51.7%上升到2022年的73.3%。考虑到两次调查问卷设置的选项不同,2017年比2022年多设置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终将会善恶报应”(占22.3%)选项其实可以合并到“一定不会这么做”中。个体既然相信善恶报应,一般而言就不会去做恶事,所以2017年选择“一定不会这么做”的总比例是 $51.7\%+22.3\%=74.0\%$,与2022年的73.3%几乎相同。选择“通常不这么做,关键时刻会这么做”的变化也不大(2017年为24.9%,2022年为23.8%),选择“会这么做”的依然是极少数(2017年为1.0%,2022年为2.9%)。这说明保持德福一致是中国人的稳定信念。

总之,就个体内的德性而言,个体的德性总体上是完备而充足的,个体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二)个体在知行关系上存在德行不足

对于个体道德而言,不仅要重视内在的德性,更

要关注外在的道德行为。因为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是一种以指导人的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的正确行为方式为内容的精神,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5]108}。一个人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究竟如何,最终要体现在道德行为上。

当前,个体道德素质的主要问题就是知行分离。调查显示,面对“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个人道德素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的问题,选择“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的在两次调查中占比都是最多的,2017年达到69.4%,2022年达到52.4%。不要误认为2022年的情况好转了,事实上是更严重了,因为“道德上无知”的人增加了。具体而言,选择“价值观混乱,道德上无知”的比例由2017年的13.2%上升到2022年的19.3%;选择“既道德上无知,也不见道德行动”的比例由2017年的16.7%上升到2022年的22.4%;选择“道德虚无,没有道德意识”的比例由2017年的0.0%(当年未设置此选项)上升到2022年的5.9%。道德行为是一种自主、自觉、自控的行为,连基本的道德认知都没有又何谈道德行为。

获得道德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接受道德教育,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参加道德讲堂活动是接受道德教育的一种常见途径。针对“您听说过或参加过道德讲堂活动吗?”的问题,2017年只有9.7%的人参加过,到2022年下降到5.1%。有接近半数的人(2017年为55.4%,2022年为43.2%)“没有听说过”道德讲堂活动,选择“听说过,但没有参加过”的比例由2017年的34.9%上升到2022年的51.7%,这显示出人们接受道德教育的积极性在下降。如果说因没有听说过此活动而没有参加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明知有此活动却没有参加就是在主观上不愿接受道德教育。是认为此事不重要吗?结合另一个问题“您觉得开展道德讲堂这样的活动有意义吗?”却发现,选择“很有意义”的比例竟然非常高并且越来越高,由2017年的77.6%上升到2022年的86.6%;选择“可有可无”的比例由2017年的17.1%下降到2022年的10.2%;选择“没有必要”的比例由2017年的5.4%下降到2022年的3.2%。这说明,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接受道德教育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在实际行动中不愿去接受道德教育,这是典型的知行分离。

不只在接受道德教育的问题上存在知行分离,在具体的日常道德实践中知行分离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调查中,面对“您听说过一些道德模范或身边好人的故事吗?您愿意像他们那样做人做事

吗?”的问题,选择“知道一些,他们很了不起,应努力向他们学习”的在两次调研中都是最多的(2017年占52.0%,2022年占35.6%),说明人们知道“应做”此事;与此同时,选择“知道一些,很敬佩他们,但自己学不来”的也不少(2017年占28%,2022年占32.3%),说明具体到自己身上大部分人就做不到了。“应做”与“能做”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是典型的知行不一。当然也有人(2017年占4.6%,2022年占7.5%)选择“知道一些,我感到他们那样做有点不值得”;还有一些人(2017年占15.3%,2022年占24.5%)压根就“没有听说过谁是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所以,就趋势而言,知道“应做”的人在减少,实际“做不到”的人在增加,说明人们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都呈现下降趋势。

关于知行关系,王阳明曾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卷上》)在他看来,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高度统一。道德不能只停留在知“道”的层面,而应该落到行“道”上。对于个体道德而言,常常是知易行难,很多道德规范不是不知道,而是往往做不到。所以,增强人们的道德实践能力特别是自觉践行的能力,非常重要。为此,可以通过加强道德教育、创造实践机会、细化道德规范、营造良好氛围等方式,引导个体做到知行合一。

二、家庭美德:和谐背后的张力与危机

家庭作为最初的、自然的伦理实体,是个体成长

表3 人们对待离婚的态度情况调查

下列说法您是否认同?

	是否离婚主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利益		是否离婚应该从家庭整体(尤其子女)考虑		婚姻不仅是个人的事,应当兼顾社会后果和社会评价		婚姻应当是自由的,如果有更满意或更合适的人就与现在的配偶离婚		婚姻意味着责任,要考虑给对方造成什么后果,不能轻率地选择离婚	
	2017年	2022年	2017年	2022年	2017年	2022年	2017年	2022年	2017年	2022年
完全不同意	21.0%	19.4%	1.8%	3.4%	5.5%	4.1%	36.5%	32.1%	1.4%	2.8%
不太同意	44.7%	43.3%	12.9%	10.7%	27.1%	17.7%	41.4%	44.3%	10.5%	11.7%
比较同意	27.5%	32.4%	54.4%	50.1%	52.1%	48.0%	19.2%	17.0%	53.2%	48.3%
完全同意	6.8%	4.9%	30.9%	35.8%	15.2%	30.2%	2.9%	6.6%	34.9%	37.2%

第二,对待离婚的态度:认为家庭的责任大于个人的任性。马克思认为“已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的本质”^[7],这一观点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应优先于个人的随意行为。一个人对待离婚的态度更能衬托出其对于婚姻的责任感。对比两次调查

过程中接受道德教育、养成道德品行的第一站。个体应该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以成员身份与家人进行交往。家庭美德是指在家庭生活中所倡导和实践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家庭美德主要调节横向的婚姻关系和纵向的亲子关系。

(一)婚姻与两性关系:传统婚姻伦理与现代两性道德的张力

1.婚姻伦理方面依然保留着传统的主流观念

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夫妻和睦是家庭美德的要求之一。人们的婚姻观可以从对待结婚和离婚的态度来分析。

第一,对待结婚的态度:认为爱情与义务相伴而生。黑格尔认为,“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婚姻的主观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缔结这种关系的当事人双方的特殊爱慕”,“婚姻的客观出发点则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同意组成为一个人,同意为那个统一体而抛弃自己自然的和单个的人格”^[6]。也就是说,夫妻关系以爱作为直接的、现实的内容,其伦理要求是“双方人格的同一化”,爱情与义务相伴而生。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面对“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您是否愿意为对方改变自己?”的问题,选择“愿意”(包括“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的比例明显多于选择“不愿意”(包括“非常不愿意”和“不太愿意”)的比例,并呈现上升趋势,由2017年的76.6%(52.7%+23.9%)上升为2022年的83.7%(67.1%+16.6%)。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在婚姻中为了实现“双方人格的同一化”而愿意改变自己,人们的婚姻观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数据发现,人们对待离婚的态度变化不大。这说明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趋于稳定,关于离婚伦理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婚姻意味着责任,要考虑给对方造成什么后果,不能轻率地选择离婚”,“是否离婚应该从家庭整体(尤其子女)考虑”,而不应“主

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因为“婚姻不仅是个人的事，应当兼顾社会后果和社会评价”，反对那种“如果有更满意或更合适的人就与现在的配偶离婚”的所谓“婚姻自由观”。这些都说明夫妻在婚姻中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家庭的责任大于个人的任性。详情见表3。

2.两性道德上展现出拥抱现代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趋势

两性关系是婚姻关系的衍生物，与婚姻伦理上大多数人守望传统观念不同，人们在两性道德上展现出拥抱现代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趋势。

对比两次调查数据发现，人们对“试婚”“同居”的态度越来越包容，持中立态度的比例最多，并且选“中立”和“赞成”的比例普遍提升，选“反对”的比例普遍下降。特别是对待“试婚”的态度变化更大，持“比较赞同”的比例由2017年的8.6%上升到2022年的19%，持“比较反对”的比例由2017年的32.5%下降到2022年的21.2%。这表明两性关系日益开放。详情见表4。

表4 人们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情况调查

您对以下现象的态度是什么？				
	试婚		同居	
	2017年	2022年	2017年	2022年
完全赞同	0.6%	2.5%	0.8%	1.9%
比较赞同	8.6%	19%	9.1%	13.7%
中立	37.3%	40%	41.8%	42.9%
比较反对	32.5%	21.2%	29.1%	24.7%
强烈反对	21%	17.3%	19.2%	16.7%

试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通常是指一对情侣在正式结婚前选择同居一段时间，以测试彼此的适合度和生活习惯；同居是指一对情侣在没有正式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共同生活。这两种两性生活方式有其优缺点。就其优点而言：一是增加双方的亲密感，试婚、同居可以让情侣在日常生活中更深入地了解彼此，增进感情；二是增进生活方式的兼容性，在试婚、同居期间，双方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以判断是否适合长期相处，减少未来离婚的风险；三是提升个体的自由度，试婚、同居通常比结婚更灵活，双方可以在不需要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选择分开或继续发展关系。但试婚、同居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法律风险明显，试婚、同居关系在法律上不属于婚姻关系，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风险；二是情感不稳定，试婚、同居可能让一些人感到缺乏承诺，从

而影响关系的稳定性；三是试婚、同居可能使一些人对婚姻的认真程度降低，影响婚姻的正式性。对于那些经历过试婚、同居而未最终走入婚姻的情侣，可能会导致对未来伴侣的信任感和承诺感的动摇，影响他们的婚姻观念和未来的关系选择。

的确，每个人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人不能只考虑自己，“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特别是两性关系，因其直接与人类的繁衍密切相关，更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非常重视婚姻的神圣性和正式性，通过道德、法律、宗教、习俗等诸多规范来约束两性关系。今天，在看到人们更加关注婚姻质量和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应认识到，过度开放的两性关系对家庭的稳定和种族的繁衍会产生不利影响，冲击家庭的伦理承载力。

(二)亲子关系：父慈子孝背后的代际危机

尊老爱幼是家庭美德的必然要求，纵向的亲子关系主要涉及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和代际传递三个方面。

1. 赡养父母观念被广泛认同且根深蒂固

赡养父母是子女必须履行的义务。调查中面对“无论父母对自己如何，都应当尽赡养义务”的问题，人们的观点高度一致，并且两次调查的数据几乎没有变化，选择“同意”（包括“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比例2017年为92%，2022年为92.5%；选择“不太同意”的比例两次都是6.8%；选择“完全不同意”的比例2017年为1.2%，2022年为0.7%。这说明，赡养父母的观念被人们广泛认同并且根深蒂固。

如何赡养父母？《论语》中有很多论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孔子以反问的方式强调物质方面的供养只是孝敬父母的最基本要求，内心对父母的感恩与尊敬才是孝敬父母的最本质要求，两者缺一不可。在面对“您认为理想的养老方式是怎样的？”的问题时，选择“与子女同住养老”的最多，2017年占53.3%，2022年占37.0%，如果加上2022年新增的“与子女在同一小区分开居住养老”（占15.5%）的话，总和依然高达52.5%。而选择“养老院养老”的比例越来越少，由2017年的13.4%下降到2022年的2.7%。究其原因，养老院更多的只能提供物质供养，而精神供养方

面远不如家庭。可见,晚年生活有子女相伴,享受天

伦之乐,是老人的最大心愿。详情见表 5。

表 5 理想的养老方式情况调查

您认为理想的养老方式是怎样的?

	在自己家找保姆养老	与子女同住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 (社区托老所、日间照顾中心、专业养老服务机构上门照护)	养老院 养老	朋友结伴互助 养老	入住专 门的养 老社区	(候鸟式) 旅游养老	医疗与养 老服务一 体化的机 构养老	与子 女在 同一小区 分 开居 住 养 老	其他
2017 年	14.3%	53.3%	无此选项	13.4%	17.8%	无此选项	无此选项	无此选项	无此选项	1.3%
2022 年	9.2%	37.0%	19.9%	2.7%	4.7%	3.0%	3.2%	4.8%	15.5%	无此选项

2. 抚育子女方式呈现民主平等的良好氛围

抚育子女是父母的天职。黑格尔指出:“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正是从这种情感产生出来的:他们意识到他们是以他物(子女)为其现实,眼见着他物成长为自为存在而不返回他们(父母)这里来;他物反而永远成了一种异己的现实,一种独自的现实。”^[9]为了把子女培养成独立的个体,家长需要注意抚育方式。调查数据显示,家长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呈现出民主、平等的良好氛围,并且两次调查的数据变化不大,表明这种做法已趋于稳定。面对“如果孩子面临重大问题(婚姻、升学、就业等)时,您的态度是什么?”的问题,综合两次数据的平均值发现,选择“只提建议,让他们自己选择”的比例最高,占 38.6%;选择“积极建议,努力说服他们采纳”的占 25.1%;而选择“全部包办,替他们做决定或搞定”的只占 4.8%;选择“不表态,免得子女将来埋怨”的只占 8.3%;选择“经常提出建议,但大多不起作用”的只占 3.0%;选择“没有孩子/孩子太小”的占 20.3%。这说明,绝大多数家长既不会不管不问,也不会大包大揽,而是采取建议、引导的民主平等方式帮助孩子对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抉择。

3. 代际传承面临家庭人伦关系断裂的危险

在看到父慈子孝的和谐画面的同时,对家庭而言一个隐形的危机正慢慢袭来。面对“您认为现代家庭关系中令人担忧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的问题,在 12 个选项中,2017 年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老无所养”(占 22.7%),“只有一个孩子,对家庭的未来没把握”(占 21.7%),“婚姻不稳定,年轻人缺乏守护婚姻的意识和能力”(占 14.8%),“代沟严重,父母与子女之间难以沟通”(占 12.2%),“年轻人不愿结婚,或不愿生孩子,家族传承危机”(占 11.1%)。到了 2022 年,顺序出现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年轻人不愿结婚,或不愿生孩子,家族传承危机”(占 28.7%)由原来的第五位跃居第一位,“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

老无所养”(占 23.7%)退居第二位,并且第一名高出第二名 5 个百分点,而其他选项的排序几无变化。这表明,人们对于年轻人不愿结婚或不愿生孩子导致的家族传承危机的担忧压倒了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导致的老无所养的担忧;从担忧只有一个孩子的难处到担忧一个孩子也没有的危机,从担忧无人给养老到担忧家族无后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家庭代际传承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面对代际传承的危机,人们的生育意愿如何呢?在回答“您认为生育孩子是否是一种义务?”的问题时,选择“是,这是人类繁衍的需要”的比例由 2017 年的 25.1% 上升到 2022 年的 32.8%,说明人们对于生育孩子是人类繁衍的必需这个“大道理”越来越懂;选择“不是,社会发展使得生育观念可以多元化”的比例由 2017 年的 28.2% 骤降为 2022 年的 1.2%,说明人们不再认同这一观点,而是倾向于认同“生育孩子是一种义务,生育观念不可以多元化”。但具体到自己的行动上却出现了反差,选择“是,这是家族血缘延续的需要”的比例由 2017 年的 40.5% 下降到 2022 年的 30.3%,选择“不是,生育孩子是夫妻的自主选择”的比例更是由 2017 年的 0.3% 猛升到 2022 年的 22.9%。说明在生育问题上人们考虑更多的是个体的自由,而不愿承担家族传承和人类延续的责任,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如何增强人们的家庭责任感和人类义务感,鼓励人们结婚生育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从国家陆续放开生育二孩、三孩的限制到生育补贴的发放,都昭示着政策层面的持续发力。伦理层面也需引导年轻人正确看待个人的自由与责任,以“大我”指引“小我”,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生和人类。

三、职业道德:普遍提升与个案隐忧

2025 年 4 月,中宣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新

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加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10]这指明了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现代社会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社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职业道德是指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体现一定职业特征的、调整一定职业关系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影响着个人的职业行为，而且塑造着行业的整体形象，关系着职业本身的发展。正如涂尔干所言：“职业伦理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11]

（一）职业认同普遍提升

人们对职业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决定着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在调研中，针对个人与单位间的关系，选择“个人和工作单位之间是聘用或雇佣关系，通过工资和付出劳动相连接”的比例由2017年的46.8%下降为2022年的44.2%，选择“不只是利益关系，应当还有很多情感的联系，应当共命运”的比例由2017年的35.4%上升到2022年的37.6%，选择“个人是单位的一分子，单位如同个人的另一个家”的比例由2017年的17.5%上升到2022年的18.1%。这说明，尽管有接近一半的人认为个人与单位之间是聘用或雇佣关系，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二者不只是利益关系，对单位的情感、对事业的追求占的分量在逐渐增加。职业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还应该包括责任和追求。正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所言：“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2]

古人讲“三百六十行行出状元”，今天的职业划分更加细致，各行各业都是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自古以来，有些职业一直被人们所看重，如负责管理国家与处理政府事务的国家公职人员，负责挽救生命的医生，负责传承人类文明的教师，人们对他们寄予很高的道德期望。202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面对列举的“一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党政干部”“中小学教师”“高校科研院所教师/专家学者”“医生”“农民”“工人”“商人”“演艺人”等选项，人们对国家公职人员（包括一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党政干部）、医生、教师的信任度位居前三，对比2017年和2022年的数据可以发现信任度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之所以信任这几类职业的人，与其

职业道德和职业形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信任度，对“一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选择“信任”（含“完全信任”和“比较信任”）的由2017年的70.5%（6.9%+63.6%）猛增到2022年的84%（22.3%+61.7%）；对“党政干部”^③的信任度2022年竟然达到91.2%（20.4%+70.8%），位居所有职业之首，值得深入分析。

（二）官德政德赢得赞誉

在古代，官员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往往被视为高高在上的存在，他们的决策和行为直接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然而，民众的反应并不只是被动接受，反而在许多情况下表现出强烈的抵抗和反抗情绪，这种情绪的根源在于官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差异和权力不对等。但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信任度却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人民群众与国家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国家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广大民众的高度信任是必然结果。

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直接承担管理国家事务的职责，所以对其素质的要求也最高，德、能、勤、绩、廉都要优秀，其中德是第一位的。正如司马光所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周纪》）官德一般是指国家公职人员的品德修养和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政德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德泛指执政者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狭义的政德特指国家公职人员在具体行政中所体现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官是民的表率，官德影响民德，官风决定民风，官员要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引导百姓。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反映了道德文化的特点。普通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往往受道德权威和道德榜样的影响很大，道德权威或道德榜样一旦崩塌，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道德危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3]

做任何事情，目的是最关键的。对于官德而言，

为什么当官是首要问题。面对“您认为干部当官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在两次调研中选择“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的都是最多的,并且占比越来越高,由2017年的45.4%上升到2022年的61.6%;选择“为国家与社会做贡献”的比例由2017年的27.0%上升到2022年的46.8%,这反映出官员的职业观正确。当然,选择“为家庭增光,光宗耀祖”的比例也比较多,由2017年的25.6%上升到2022年的50.8%,这其实是一种荣誉感的体现,从事一项能够为人民、为国家做好事、做贡献的职业本身就是光荣的,职业荣誉感是一个人热爱自己职业岗位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职业道德中“爱岗敬业”的必然体现。而选择“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比例由2017年的34.3%下降到2022年的24.9%,选择“没什么特殊目的,一个稳定而待遇高的职业而已”的比例由2017年的21.1%下降到2022年的13.5%。

如果说为什么当官是官员自我评价的话,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民众对官员的评价。面对“在生活中或媒体上,当看到党政干部时,大多数情况下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的问题,选择“公仆,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比例变化最大,由2017年的19.3%上升到2022年的35.3%,说明官员形象的改善赢得了民众越来越多的赞誉。详情见表6。

表6 在生活中或媒体上看到党政干部时的想法调查

在生活中或媒体上,当看到党政干部时, 大多数情况下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2017年	2022年
公仆,为老百姓谋福利	19.3%	35.3%
官僚,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	22.2%	16.5%
有权有势的人	20.1%	29.9%
有本事的人	14.3%	11.2%
领导,决定我们命运的人	9.5%	4.8%
贪官污吏	5.7%	1.0%
惹不起但躲得起的人	3.1%	0.3%
其他	5.9%	1.0%

官德的好转带动了政德的提升。“政府不仅是政治机构,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伦理存在,伦理是其基本属性和合法性基础。”^[14]面对“您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决策时充分考虑到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了吗?”的问题,选择最多的是“有考虑,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并且比例由2017年的37.1%上升到2022年的46.3%;选择“有考虑,能够从政策文件中体会到”的比例由2017年的23.7%上升到

2022年的35.3%;而选择“只是口头上说说,没有实质性行动”的比例由2017年的28.1%下降到2022年的12.3%;选择“没有考虑,政策制度都是从自己的政绩和富人的利益着想”的比例由2017年的10.4%下降到2022年的6.1%。这说明,在行政行为中确实有道德考量,民众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可见,新时代官德和政德都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可。

(三)反腐依然任重道远

尽管对官德和政德的评价总体上持续向好,但对于腐败问题也决不能掉以轻心。腐败往往源于权力的滥用、缺乏透明度以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官员在缺乏有效制衡的环境中容易产生腐败行为。腐败不仅侵蚀着官员的道德肌体,而且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进而影响全社会的道德风气与和谐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3]69}“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5]

调查数据显示,人们最担忧的也是“腐败不能根治”的问题。两次调查中,在回答“对中国社会,您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时,选择最多的是“腐败不能根治”。当然,可喜的是这个比例由2017年的38.9%下降到了2022年的33.3%,表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显示出民众对根治腐败的信心越来越强。详情见表7。

表7 对中国社会最担忧的问题情况调查

对中国社会,您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2017年	2022年
腐败不能根治	38.9%	33.3%
生态环境恶化	27.9%	25.0%
分配不公,两极分化	10.0%	19.4%
老无所养,未来没有把握	11.6%	10.2%
生活水平下降	5.7%	10.0%
道德滑坡,社会风气恶化	3.1%	1.9%
人际关系紧张	1.2%	0.1%
其他	1.6%	0.0%

从不敢腐到不能腐再到不想腐,是一个由他律转向自律的漫长过程,需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不敢腐”是反腐工作的第一步,主要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监督机制和高压态势形成震慑力,使腐败分子

因害怕惩罚而不敢轻举妄动。这一阶段强调外部的强制性约束,通过强化问责和加大执法力度让腐败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不能腐”是在“不敢腐”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制度屏障和技术防范机制,使腐败行为难以发生。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优化权力运行机制、增强透明度以及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等手段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这一阶段强调对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约束和技术性防控。“不想腐”是反腐败工作的最终目标,强调内化于心的自律。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价值认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和人生观,使领导干部在思想深处对腐败行为产生本能的排斥。这一阶段要求在制度约束之外进一步提升道德水平和思想觉悟,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的思想根源。这种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变是一个思想境界跃升的过程。因此,反腐败工作不仅需要短期的震慑,更需要长期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引导,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最终实现“不想腐”的目标。

四、社会公德:持续向好与陌生人社会的无奈

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它是维护公共秩序、保证公共生活正常运转的基本道德要求。列宁称之为“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16]。“从发生领域看,社会公德发生在公共生活领域;从涉及人群看,社会公德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社会公德发生时,领域条件和人群条件要同时满足、缺一不可。”^[17]也就是说,活动领域的公共性和活动主体的偶然性是社会公德区别于其他道德类型的重要特征。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一个私德盛行、公德缺乏的社会,崇尚“天下一家”的中国人习惯用家庭私德推演社会公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近代以来,随着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展,公德缺乏的问题逐渐被人们意识到。梁启超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18]梁漱溟也指出:“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19]当今社会随着现代交通工具、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拓展,人际交往领域由传统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公民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不仅仅代表个人,更影响到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随着

人们在陌生人社会中相互接触的频率增加,社会公德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一)社会公德持续向好

调查中面对“您对您生活的地方(您所在的社区)社会公德状况满意吗?”的问题时,选择“非常满意”的比例由2017年的4.9%上升到2022年的17.5%,选择“比较满意”的比例由2017年的63.2%上升到2022年的69.9%;选择“不太满意”的比例由2017年的27.2%下降到2022年的11.7%,选择“非常不满意”的比例由2017年的4.6%下降到2022年的1.0%。这说明,社会公共领域层面的道德状况全面好转,人们对社会公德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表8 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方式情况调查

您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我会经常关心比我不幸的人	他人的不幸通常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不安	在做重要决定前,我会尝试从每个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2017年	2022年	2017年	2022年	2017年	2022年
完全不符合	3.0%	3.6%	14.0%	11.0%	3.0%	2.5%			
有点符合	30.6%	29.8%	27.7%	16.7%	24.8%	24.4%			
一般	33.2%	27.8%	33.9%	37.4%	38.5%	29.3%			
比较符合	28.5%	30.0%	19.9%	25.2%	26.9%	31.9%			
完全符合	4.7%	8.8%	4.5%	9.7%	6.9%	11.9%			

社会公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必需,是社会成员普遍意志和公共利益的体现。公共意识是社会公德的内核,个体应该意识到自己与共同体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有明确的他人观念,要学会理解关心他人。因此,在公共生活领域,恰当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至关重要。通过调查数据发现,面对“我会经常关心比我不幸的人”“他人的不幸通常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不安”“在做重要决定前,我会尝试从每个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等选项时,2022年选择“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的比例都比2017年普遍提高了。说明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人们越来越讲究感同身受、换位思考。孔子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主张采用“忠恕之道”,“忠”是对己的要求,指尽己之心,竭尽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该做的事情,它包含了忠诚、尽责、自省等意思,是一种对自己内心的真诚和对待他人的真心;“恕”是对人的要求,指推己及人,用自己的立场去体谅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忠恕之道”的核心是“忠于己、恕于人”,即在尽力做好自己的同时,宽以待人,理解他人。这一思想既有对自我的

严格要求,又有对他人的宽容与体谅,“忠”和“恕”两个字,足以涵盖做人和处世的道理,在今天的道德生活中依然被人们所践行。详情见表 8。

(二) 道德冷漠不容忽视

从调研数据看,社会公德的情况似乎很乐观,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由于人往往具有一种自我防御心理,习惯于展露高尚的一面,掩盖卑鄙的一面,这种倾向容易导致“道德伪善”。问卷调查时,面对这类带有社会赞许性的问题,受访者往往不管自己能不能真的做到,总会“有意无意”地选择“正确”的答案。为了尽量避免这个常见又难以克服的弊端,调查组织者特意把这种笼统的倾向性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实际的具体事例,这时一些潜在的真实情况就凸显出来了。如面对“如果在路边看到一个老人摔倒,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的问题,选择“立即上前扶起”的比例由 2017 年的 44.0% 下降为 2022 年的 32.2%,而选择“先拍照再扶起,免得被讹诈”的比例由 2017 年的 7.2% 猛升到 2022 年的 25%。这说明,此前偶有发生的扶老人被讹诈的事件对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有的人面对此种情形时尽管不会袖手旁观,但也顾虑重重。详情见表 9。

表 9 看到老人跌倒后的反应情况调查

如果在路边看到一个老人摔倒,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017 年	2022 年
立即上前扶起	44.0%	32.2%
有别人证明时再扶	26.7%	24.5%
先拍照再扶起,免得被讹诈	7.2%	25.0%
躲避,免得惹祸上身	9.9%	5.6%
报警	11.1%	12.7%
其他	1.0%	0.0%

又如,面对“当有陌生人走进您的单位或社区,或在车厢中与陌生人在一起时,您经常的态度是什么?”的问题,选择“没有任何反应”的比例最大,并有上升趋势,由 2017 年的 29.5% 上升到 2022 年的 34.7%;其次是选择“对他/她微笑”,但呈下降趋势,比例由 2017 年的 32.1% 下降到 2022 年的 26.8%。这说明,人们对陌生人变得越来越冷漠,这种冷漠不仅是消极的不与人交往,还表现为不愿主动帮助陌生人,也即道德冷漠。正如“假设您双手抱着东西走进电梯,您觉得电梯里的陌生人可能会怎样?”这个问题的数据所显示的,“当作没看见”的比例毕竟是少数(2017 年为 15.1%,2022 年为 17.8%);选择“主动问您去几楼并帮您按楼层”的比例也不太多,

并呈下降趋势,由 2017 年的 37.5% 下降到 2022 年的 32.0%;而选择“会在您的请求下给予帮助”的比例最多,并呈上升趋势,由 2017 年的 47.4% 上升到 2022 年的 50.3%。这反映出在与陌生人交往中人们是有界限的,对方不主动要求,自己不会主动给予,这可以称为边界感,即个体在社交互动中对自己和他人之间界限的敏感度和认知。良好的边界感能够帮助人们维护自我尊重和对他人的尊重,促进人际关系的融洽。但过分注重边界感,明明看到别人需要帮助还不主动出手,那就是道德冷漠了,不符合社会公德中“助人为乐”的要求。

道德冷漠是指个体或群体在面对他人需要帮助、社会不公或不良行为时,缺乏同情心和责任感,不愿意采取行动或表现出冷漠无情的态度。造成道德冷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当个人利益被过分强调时,容易忽视对他人的关心和社会责任感;对风险的恐惧使一些人害怕因帮助他人而招惹麻烦,选择保持冷漠以避免潜在风险;个体与周围环境交流不畅,自身对所在的场所没有亲切和踏实的感觉,没有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自然不愿与人交流。对比两次调查数据发现,面对“您在工作或生活的地方,有没有一种亲切和踏实的感觉?”的问题,无论是在单位、在社区/村抑或城市,选择“有”的比例都在上升;选择“还可以”的比例都在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原本以为选择“没有”的比例也应该在下降,但数据显示却有两处(所在单位、社区/村)在上升,仅有四处(所在城市)在下降。这说明,在陌生人云集的城市,不管是否融入城市,个体一般不会感到异样;而在与自己有直接关联的小群体(单位、社区/村)中,融入与没融入的区别却很明显,融进去了就会感到亲切踏实,融不进去就会倍感孤独;也就是说,在小群体中容易出现两极分化。所以表现出的变化趋势就是:选择“有”亲切和踏实的感觉的比例在增加,选择“没有”的也在增加。详情见表 10。

表 10 生活或工作地方是否有亲切感的情况调查

您在工作或生活的地方,有没有一种亲切和踏实的感觉?						
	所在单位		所在社区/村		所在城市	
	2017 年	2022 年	2017 年	2022 年	2017 年	2022 年
有	19.5%	29.8%	25.6%	31.7%	26.1%	33.1%
还可以	68.0%	53.3%	68.5%	61.0%	65.0%	60.3%
没有	12.6%	16.9%	5.9%	7.3%	8.9%	6.6%

这就提醒我们,社会公德建设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克服社会冷漠特别是道德冷漠需要多措并举。

一是营造关爱氛围。通过社区活动、志愿服务等方式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既要重视提升宏观层面的城市的包容度,又要重视微观层面的小群体(单位、社区/村)的人际交往,通过构建新型熟人社区所带来的社会公德正能量来抵消陌生人社会的冷漠。二是加强道德教育。培养人们的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促使人们认识到帮助他人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保证自身安全和心理舒适的需要。三是发挥榜样力量。通过传播正能量和榜样故事,激励人们积极行动,让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扭转冷漠的社会风气,构建更加温暖和谐的社会。

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党的十八大以来道德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各领域总体上都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发展势头,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小觑。由于治理不同于管理,也不同于统治,治理强调的是多元共治,“道德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携手合作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进行克服与消除的活动和过程”^[20],所以在今后的道德治理中需要多方用力、持续推进,才能臻于至善。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20}在道德治理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能够为道德治理提供正确的方向和强大的组织保障,使道德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党的领导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道德治理体系。

第二,注重法治建设。法治和德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最主要方式。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社会,道德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然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单纯依靠德治难以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和挑战,必须通过法治来进行规范和约束,所以在道德治理中应将现代性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纳入其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21]政府在道德治理中扮演着引导和规范的角色,其职责不仅限于制定法律法规,还需要加强对官德和政德的塑造,以此带动全社会的道德

风气,通过政策引导正向社会价值观的形成。

第三,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不可或缺,社会组织和团体在道德治理中起着桥梁作用,它们能够有效传达公众的道德期待与需求,并在社区层面推动道德行为。社会组织和团体可以通过开展道德宣传活动、志愿者服务和公益项目等,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道德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自下而上的道德建设方式能够更深入地影响个体的道德观念,使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社会道德规范。此外,社会舆论的引导同样重要,媒体在传播道德价值观、塑造社会风气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正面报道与宣传能够激发人们对道德行为的向往,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

第四,夯实教育阵地。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价值观的塑造。学校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承担着培养学生道德素养的重任。在课程设置中,学校可以将道德教育融入各学科的教学中,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和感悟道德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和责任感。此外,学校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也极为重要,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同学之间的关系,都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道德观念。

第五,强化家风家教。家庭教育是家庭美德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在道德治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22]品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的氛围与价值观念,都对孩子的道德养成产生深远影响。家风是家庭美德得以弘扬的效果表现,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标准。家风的塑造往往与家庭成员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密切相关,良好的家风是家庭教育的基石,它能够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家庭氛围,促进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家风家教建设,推进传统家庭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道德治理的重要途径。

第六,立足个体修养。个人在道德治理中是最基本的单位。每个个体的道德选择和行为都对社会道德水平产生影响。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都以个人品德为基础,是个人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公共生活领域的德性和德行的具体体现,所以在整个公民道德体系和国家道德治理中,个体的品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个体应主动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增强自我反思和自我约束的能力,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践行道德规范,推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

总之,道德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力量的关联与支撑。党的全面领导、政府的政策法规引导、社会组织的参与、学校的教育培养、家庭的道德熏陶以及个体的自我修养,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道德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各个部分协调运作、形成合力。因此,在今后的道德治理中,各方应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建立起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调整与优化各项措施,以应对新出现的道德挑战,进一步提升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功效。

注释

①东南大学樊浩教授的团队自2007年以来已开展四轮(2007年、2013年、2017年、2022年)全国伦理道德发展状况调查,本文获得授权使用的是2017年和2022年的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拥有中国国籍、在中国大陆抽取的区县内居住满6个月的18—65岁的居民。2017年调查完成有效样本8755个,2022年调查完成有效样本8712个。②在调查中请受访者从18种德性中分五轮分别选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德性,此处因篇幅所限,只把每轮数据中排在前列的德性析出组成下表,故该表中每年的数据相加之和不等于100%。③“党政干部”在2017年的调查问卷中未单列。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8.
-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

- 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N].光明日报,2014-05-05(2).
- [5]《伦理学》编写组.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77.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83.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
- [10]中宣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实施纲要》[EB/OL].(2025-04-21)[2025-04-21]<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0421/7486d0c0f58846ca9e4ef8f0c22cb4b1/c.html>.
- [11]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
- [13]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赵乐际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光明日报,2018-03-11(1).
- [14]樊浩.伦理道德,如何才是发展[J].道德与文明,2017(4):5-22.
- [1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5-10-29(1).
- [1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
- [17]王晓丽.社会公德治理:缘起、运行、实现——以共享单车使用为例[J].道德与文明,2018(5):130-136.
- [18]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9.
- [1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9.
- [20]龙静云.道德治理:核心价值观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N].光明日报,2013-08-10(11).
- [21]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J].求是,2015(1):3-8.
- [22]习近平.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J].求是,2025(3):4-7.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Moral Governan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o Qingjie

Abstract: To grasp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moral governan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 can examine personal character, family virtue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morality.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data from two national surveys on ethic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reveal the following: in terms of personal character, there is a characteristic of “sound virtues but insufficient conduct”; in terms of family virtues, there is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marital ethics and modern gender morality in marriage and gender relations, and a hidden cri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behind the parent-child bond of “parental kindness and filial piety”;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on the basis of generally improve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ficial morality and political ethics have won high public praise, but the road to completely eradicating corruption remains long; in terms of social morality, amid an overall positive trend, the phenomenon of moral indifference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future, to promote mor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moral governance system consisting of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guidance from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by schools, moral edification in families, and personal self-cultivation, realizing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and forming a synergistic force.

Key words: moral governance; personal character; family virtues; professional morality; social morality

责任编辑:思 齐